

编读往来

“夫子楼” 应名“夫之楼”

周安林

我市精心打造的湘江中的东洲岛景区，在岛南为纪念王船山先生诞辰400周年而建造的高楼和配套庭园，其命名应该是“夫子楼”还是“夫之楼”？

我认为，以先生之讳“夫之”命名，则名实相符，无可厚非；但如以“夫子”名之，虽名义上拔高了楼的“档次”，但确是无据之作，无益先生。

船山先生乃中国一代文化之集大成者，作为世界历史文化名人而不能称“夫子”，并非因其资格不够，而在于清朝政府囿于政见，审批手续工作没做到位。

在国人的习俗里，对有学问的人，交往中习惯在姓别后加“夫子”，或直称“老夫子”以示尊敬，说者出于善意，知趣者诚惶诚恐答以“岂敢、岂敢”。此非谦辞，实乃读书士子必守本分不敢逾越先师诸夫子的虔诚崇拜之心也。上溯二千余年，中国历史上能得皇封“子”者入祭大成殿（俗称夫子庙）和专祠祭祀、荫封子孙者无多人，“子”即先师，学宫外牌楼上书“道贯古今，德配天地”，意思就是“子”之功德泽惠有如天地。杰出如周敦颐谥号元公，意是宋后新儒学诸子之首，嘉封“学达性天”“道南正脉”御匾以彰其代表的理学通天达地的正统地位，历朝史志煌煌有载。

中国先时文化传承是以祭祀列首、次在教育的读书方式进行的，这是我们的先人们延绵数千年最高明的亮丽之处。祭祀的目的在于增加人们对先圣先贤的心仪崇拜，增强对圣学的精神认知，从尊敬圣人事功人品切入，然后学习他们的道德思想文章，修养践行终生。所以历代文人最讲究气节，教育本旨在做人尽负天下之责，而不是钻入钱眼、只图自家富贵之乐。这也是石鼓书院宋景定五年（1264）工部尚书汤汉作《先贤堂记》，以官府仪规格祭祀十六位贤人之始、后有七贤、再有后七贤之尊不逾矩。

唐以前，孔子是元圣周公旦祭祠中的陪祀。从唐太宗到唐玄宗数次封孔，孔子称至圣而专祠祭祀。元圣周公则逐渐居次，传于东、中、西三庙专祠（曲阜、洛阳、岐山）。

自宋仁宗庆历4年（1044）下旨始设县学，各地学宫祭祀逐渐规范。以乾隆25年（1760）《清泉县志》和乾隆《衡州府志》载，能入大成殿享祭，以皇封至圣孔子、复圣颜回、宗圣曾参、述圣子思、亚圣孟轲5位，先哲12位配正殿两侧陪祀（神主牌位还是称先贤，不称先哲）、先贤77人、先儒46人者方可列入东西两庑，合计神位入大成殿享祭140人。其中孔子及其学生72贤人分别列入圣、哲、贤、儒，后之所封只有67人。

能入祀称“子”又能隆显垂誉于后世者，必须是其中贤以上的杰出者，由朝廷授封先人，惠及后世世袭荫封子孙者只有11人。而入学宫敬入崇圣祠享祭，雍正元年（1723）孔子先祖五代封王，后裔世袭衍圣公，称“天下第一家”。其他10人一旦受封，故里设专祠，立祭祀田，其父母神位入祀乡贤祠，再入学宫另立的启圣祠，雍正元年改称崇圣祠。后裔世袭五经博士，专祠选袭奉祀生，选后裔中优秀者入当地学宫读义学作预备奉祀生培养。上述包括孔子共11人，即创建儒学的前五圣，创立新儒学的宋六子。年拨官银助祭（各专祠乾隆六年（1741）始每年拨银40两，此前12两）。可谓一人封“子”，惠先泽后，直至清亡。

自宋封六子（周、二程、张、邵、朱）至明只封理学有名人物胡安国、张栻、吕祖谦、王阳明等20余人先儒，顺治元年下旨（1644年）重申“先贤周子祀于厥里（故乡）庙庭、天下学宫”。顺治二年再封孔子重申明确其传统待遇，清朝政府重申封周子、孔子之举，旨在团结士子、公示清政府尊敬新旧儒学两位领袖人物的文化认同，此后再无封入祀大成殿者。

船山先生乃一代宗师，宋以后难得的人杰，其气节学问均高山仰止，因在他以反清复明为己任，康熙31年（1692）卒，寿74岁。清廷官员定性他是“明遗臣，清逸士”。直到他死后15年的康熙46年（1707），经张任可等官员力推，才皇封入乡贤祠享祭祀之礼，圆湖湘士子经年不息的呼吁之愿。乡贤祠虽同在学宫，但是另立次位之祠。

王船山先生400周年诞辰在即。如以“夫之”名，则名实相配一体，自可垂誉千秋无憾，而先生之事功在人们心目中远胜如诸“子”者，遵史循实命名更有利弘扬先生精神。

船山学说是怎样为世人所认识的

何芬

衡阳市湖湘文化研究员周安林老师的这篇稿件在我邮箱已有一个多月，期间，我在看完全稿那天便决定配发一个《编读往来》的文，于是断断续续地看了相关的几本书。我看书的过程，耽误了不少时间。

我想，周安林老师所说的王夫之到底有没有在清朝实现配享孔庙两庑的待遇，多少涉及王船山的民族主义与清政府对其认同经过。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衡阳市井间谈到王船山就是说他“头戴斗笠，脚着木屐，头顶清朝的天，脚不踏清朝的地”这种形象。今天，我不谈周安林老师说是不是完全对。我们不否认王船山反清复明，但还是要结合同时代的人物群像来理解王船山的民族主义。我个人认为这种态度能让我们腾出手来多关注王船山精神与王船山思想。

首先，我们将王船山反清复明的事情放到当时的时代中去比较，就不难发现王船山兄弟父子所遇到的被张献忠等农民起义者挟持，甚至要自毁以逃脱的事情，不是只有他们父子兄弟才遇到。王船山颠沛流离、四处奔走的形象，不只为他独有，而是同时期不少的亡国之读书人所共有的。

我从《船山师友记》中选几个亡国的读书人的样子，给读者体会一下。

熊渭公，黄冈人，住在武昌。还不是清军入关，尚且是张献忠兵乱，在城破前一日，他留下书说“明日当觅我于某树下”。然后，到了那一天，他按自己说的到了树下，追兵来了，他就跃入通山王莲池自尽了。

郭季林，崇禎乡举人，乱后隐居石狮子岭下，竹坞药栏，日吟啸其中以自娱。

李跨鳌，十五成诸生，经乱世，子夜燃松脂读书，声朗朗彻山外，雪夜月夕，独携方竹杖登警山顶，忽而哭忽而歌。

夏汝弼，得知“明桂王子”不能成事。夏汝弼在邵阳梓田山那里带着一个琴童登山，流连山中，“歌哭无恒”，因为那里可以看得到“明桂王子”走过的官道。

夏汝弼，就是曾与王船山一起反清复明的人。还有一个就是王船山的患难之交管嗣箕、管嗣裘兄弟。《船山师友记》“管文学嗣箕”条目中，就谈到管嗣箕三次死里逃生。第一次死里逃生，在张献忠攻陷衡州时。当时，张献忠动辄就投入于湘水。张献忠要捕杀管嗣裘，管嗣箕为保弟弟的名节，对来人说弟弟已经死了，然后代弟弟应捕。第二次，就是他王船山一起反清复明，死里逃生。

从王船山家谱世系表中可以看到，明朝的灭亡，对于王船山家庭的打击也是巨大的。虽然，王家有世袭的衡州卫指挥同知职位，虽然王船山爷爷没有继承这个世袭职位。但朝代更替，王氏家族这个世袭的职位也没有了，过去管辖的卫所军户屯田因为朝代更替化为乌有，家族没落。这从王船山家谱的相关研究著述中可以看到。

第二个，在明末清初这种环境下，也不止王船山一个人上下求索、著书立说。这么说，不是消解王船山精神和思想的意义，反之，是更能给王船山精神和思想的形成加上一个纵深的历史视角。

船山研究的代表人物萧蓬父曾为陆复初的《船山学案》作序。从萧蓬父的序文可以看到，比王船山年长6岁的顾亭林，比王船山大9岁的黄宗羲，他们与王船山三个人，并列为明清之际的中国启蒙三大师，他们的经历何其相似！

在反清复明方面。清顺治二年即1645年，顾亭林等人在昆山起义，失败后，开始了流亡生活；明鲁王在浙江，黄宗羲迎鲁王，驻军江上，号忠贞营；而王船山则是在1648年举兵衡阳。

在著书立说方面。截取南明王朝灭亡前后这段时间来看，1662年，黄宗羲写成了《明夷待访录》；顾亭林写成了《天下郡国利病书》巨著；第二年，王船山写成了《周易外传》《尚书引义》。1665年，王船山又完成了《读四书大全说》的重订，顾亭林整理《日知录》和《音学五书》……

在与清廷关系方面。1679年，清方派人侦视王船山，船山对此作了《勘破窗纸者爰书》《斋中守犬铭》以讽之；黄宗羲坚辞清廷邀请他参加修《明史》的敦请，但允许派人到其家中抄录史料，并允其子百家、弟子万斯同去京以备顾问；这一年，顾亭林避清廷敦请，常驱骡往来陕西一带。

对于王船山的民族主义和他的“不贰臣”的个人感情，我跟正在整理自己的王船山专著衡阳本土文史专家萧培请教，如何理解？萧老谈到，王船山就是从隐居常宁西庄源时，开始了他的著述工作，这是王船山不同于与他一起反清复明的人的地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节点。相比这个时期也就是王船山早期的著述，萧老说，读王船山晚期的著述特别是史论时，发现王船山对清廷还是有不满，但已经有转变，更反映出一种对封建专制的批判。“要不然，他不会让他的儿子去参加清廷的科举考试”。

我们再来看看萧蓬父对王船山的评价。萧蓬父认为王船山哲学思想是中国朴素唯物主义和自发辩证法思想的

高峰。萧蓬父分析了十七世纪的时代思潮、社会生产特点，并引张舜徽先生对王船山“博大求实”四字评价，即求实以反对蹈虚，博大以概括细节，认为这是批判理学的锐利武器，也正足以代表中国启蒙思想的特点。

最后一点我特别要强调，一般的读者可能并不知道王船山形象经过了“国朝贞士”到“经学家”的转变。

读了《宋明理学十五讲》《王船山年谱》和一些湘学论述特别是《嘉道以前船山记忆和船山形象的演变及其特点》一文后，让我明白，继南宋湖湘学派之后，王船山思想是“湖湘学”“湘学”又一个新的符号。

王船山去世之后，其子王敬刊刻船山部分著作、撰写《大行府君行述》。在他儿子的表述中，王船山是一个忠义节气、笃学苦行的老儒形象。所以，我看这个版本的船山生平，会看哭，我觉得这就是一种中国传统的士子精神、家国情怀。士子的“不贰臣”观念，是他们独善其身的一种方式、是他们精神领域的边界，是他们主体意识的一种表现，肯定是要得到尊重的。但我也相信，有这种内心需求的人，他们对自我命运的探索不会仅止于此。

第二次王船山形象的塑造，与湖南地方意识兴起有关。康熙三年（1664），湖南才独立建省。这带来湖南地方文化意识勃发。湖南学政潘宗洛首次为王船山立传“以付史馆”，但在立传时淡化王船山的反清复明，将王船山的个人际遇与家国兴亡、历史变迁联系起来考察，将船山提升为“前明之遗臣，我朝之贞士”。

乾隆年间标榜“稽古佑文”，举办一系列文化工程。期间三通馆纂修余廷燦作《王船山先生传》，重点阐发了王船山的学术成就，从学理上解释了王船山成为“前朝之遗臣，我朝之贞士”的深层缘由。这个时期，朝廷征修四库全书，王船山有的书被收入，但有的书也被禁毁。萧老说，这些书禁在清朝后来又取消了。

嘉庆年间，国史馆开修《儒林传》《文苑传》等类传，阮元直接节录余廷燦版《王船山先生传》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材料，草拟成《王夫之传》，视王夫之为传经有功的经学家。

道光年间国史馆写定《国史儒林传》，船山正式进入官方历史记忆之中。

随后，又有两次大的搜集工作。道光年间，邓显鹤刊刻了多种王船山的书，书出王船山七代孙王世全处。到了后来，曾国藩兄弟大规模地重刻增补《船山遗书》。

所以说，船山学说的博大精深就是这样逐渐为世人所认识，从此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的。